

近代以来中国世界秩序观念的变迁

任云仙

(南昌航空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摘要: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以和谐为主旨。近代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颇为流行,人们逐渐疏离了和谐观念。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帝国主义”话语,从而使国人在世界秩序观念上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革命色彩。改革开放之后,以反帝斗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观念已经不再适合发展需要,逐渐让位于以和为主要的国际秩序理念。中国人对和谐世界理念从背离到重新肯定,与百年沧桑变迁的历史情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秩序;中国中心;帝国主义;和谐世界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2-0184-06

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以和谐为主旨。甲午战争之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颇为流行,人们逐渐疏离了和谐观念。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帝国主义”话语,在世界秩序观念上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革命色彩。改革开放之后,以反帝斗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观念已经不再适合发展需要,逐渐让位于以和为主要的国际秩序理念。和谐世界是中国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国际秩序构想,其间包含着浓郁传统文化理念。中国人对和谐世界理念从背离到重新肯定,与百年沧桑变迁的历史情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对近代以来中国世界秩序观念的变迁进行梳理,既是对和谐观念之近代命运的考察,也是对中国国际秩序观念变化之必然性的历史求证。

一、晚清:从和谐有序的中国中心观到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观

晚清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念是在继承传统和应对西方的基础上形成的,充满着中西理念的矛盾与冲突。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优越性。在傲视天下的文化情结中,中国人构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和谐有序的朝贡秩序。这一国际秩序从汉代开始形成一直延续到清代,在历史的沉淀中内化为中国

人的文化心理。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这一国际秩序理念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冲击下一点点地坍塌。

(一)从天下共主到世界弱国

从天下观念到近代世界观念转变,是晚清以来中国国际秩序观念发展变化的主线。天下观念是根据儒家经典以及《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历史地理著作构想出来的,具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缺乏现实基础。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一直认为自己处于中心地位,并没有明晰的世界各国概貌。虽然历史上曾经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对人们的世界地理观念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世界的突兀出现对中国优势地位形成了挑战,但数千年累积起来的文化优越感,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从天下观念到世界观念的转变。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人们对西方了解日益增多,“春秋战国说”开始取代“中国中心观”成为国人认识世界的有效话语通道。如王韬认为西方各国“几有与中国鼎立之势,而有似春秋战国时之列国”^{[1]32-33}。彭玉麟指出:“当今日之时势,强邻日逼,俨然成战国之局,虽孔孟复生,亦不能不因时而变矣。”^{[2]桑227} 王尔敏解释道:“将19世纪世界和春秋战国比较,乃反映一种新的国际意识,自然地放下中国中心观念,以古史的镜子,重新思考中国所面对的

* 收稿日期:2008-05-20

作者简介:任云仙(1974-),女,山西文水人,历史学博士,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思想史。

基金项目:2008年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近代以来中国人和谐理念的历史变迁”(J08WB52),项目负责人:任云仙。

新世界。……从这种历史比较,以至于古代邦交经验的参考引用,却正是由中国中心的国际观念转变为对等国际观念的一个天然的有效通道。”^{[3]21-22}“春秋战国”说虽然还残留着中国中心观,但表明了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自己衰落的地位。承载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负累的中国,不可能马上从传统话语体系转向西方话语系统,以春秋战国来描述世界和中国的关系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甲午战争、庚子一役将中国仅存的一丝文化优越感冲刷殆尽,人们彻底从“中国中心观”中醒来。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中,中国人清楚意识到自己成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对象。翻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报刊、时人文集,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充斥着中国思想界。如“二十世纪以来,白色人种挟其民族帝国主义,各以吾国为几上肉”^[4];“瓜分在即,罔知死所”^{[5] (三) 92}。这些饱含着危机意识的词汇表明中国人承认了自身的弱势地位,“中国中心观”彻底坍塌了。旧世界观念的崩溃必然伴随着新世界理念的形成。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提供给国人理解世界的理论工具,使他们能够以近代的眼光看待整个国际社会。从天下观念到世界全球观念的转变过程必然是痛苦的。世界竞争的残酷性,让中国人心中充满了矛盾、痛苦和无奈。

(二) 从朝贡秩序到屈从西方外交体系

朝贡秩序是中国古代在东亚构建起来的一种世界秩序模式。这一体系在西方的强有力的冲击下逐渐瓦解。根据《大清会典》、《清史稿》、《国朝柔远记》等书记载,鸦片战前与中国有从属关系的国家主要有:安南(即越南)、缅甸、锡金、尼泊尔、暹罗(即泰国)、南掌(即老挝)、高丽(即朝鲜)、苏禄(即菲律宾)等。随着西方国际体系的扩张,中国本国及其属国遭到了西方的侵略。1881 年清政府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之后,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夺取了中国对越南、缅甸、暹罗、尼泊尔、锡金等国的宗主权。1895 年 4 月《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绵延数个世纪的朝贡秩序彻底宣布解体。如果说朝贡秩序的解体表现出中国人的无奈,那么接受西方外交制度、条约体系的过程则充斥着更多的屈辱与抗拒。条约制度和使节制度是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的重要方式。资本主义国家向有外交关系国家派遣常驻使节,是近代国家交往中的一种常规。对于这种与传统迥异的外交制度,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极大的抗拒。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税则谈判中,咸丰帝希望以全免关税为条件,让西方列强放弃公使常驻北京条款,可见其将国家体面看得颇为重要。在向国外派遣使节的问题上,国人

存在着矛盾与争论。刘坤一在奏折中称:“遣使臣往驻各国,不得令其所指,以柱石重臣弃之绝域,令得挟以为质。”^{[6]卷41,44}生员林全初从夷夏观念出发,主张遣使,试图以夏变夷。他在条陈中指出:“我亦设官分驻各国,彼以外洋百货易我金银,我亦以各国货辇之而归;彼以异端惑众,我以圣贤正学用夏变夷,未尝不可。”^{[6]卷53,24}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向国外派遣常驻使节的传统,因此,晚清时期人们对这一外交体制充满了疑惑。马嘉理事件发生之后,英国要求中国派遣使节到英国谢罪。在英国压迫下,1875 年清政府向英国派遣了驻外使节,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接受了西方的外交制度,而且也认同和屈从于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构成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从放弃宗藩体制到接受西方外交体系的过程中,充满着中国人的挣扎和抗拒,这种心态必然会影响到其对于世界的整体判断。

(三) 从和谐世界到丛林世界

和平、德化的国际秩序观念在中国有着很深刻的思想渊源。孔子思想中便蕴含着“仁”的国际观念。如《中庸》中便有“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7]中庸19章48-49}主张通过德与仁的原则达到世界和平的理想境界。孟子的国际关系思想也以“崇王道,抑霸道”为主流,如“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7]孟子·尽心下464}。孔孟思想对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念影响很大,成为汉代以后中国对外观念的主流。这种以和谐为主旨的国际秩序观念,随着中国屈从于西方国际体系,逐渐让位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的丛林世界观。

在严重民族危机意识中,传统的王道与德化理念并不适合民族的生存。进化论的传入为中国人解释世界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严复在 1895 年发表了《原强》一文,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一传入中国便引起思想界的巨大的轰动,成为知识分子变革自强以及重构世界秩序观念的有效工具。他们用这一竞争学说解释世界,传统以“德”、“仁”为主国际秩序观念被彻底颠覆了。纵观当时报刊,“弱肉强食”、“激烈竞争”比比皆是。如《东方杂志》指出:“二十世纪之国际竞争为尤烈”^[8]。《大公报》云:“生存竞争之剧烈,优胜劣败之确凿,而强权世界之可畏。”^[9]《夏声》杂志有评论指出:“处此天演竞争剧烈场中,优胜劣败,适者生存。”^[10]《申报》指出:“今之世非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世哉!”^[11]《中国日报》评论道:“天演竞争,优胜劣败,列强帝国主义,膨胀大陆,

各伸其外交手段,以攫人利权,占人土地,为彼殖民地之政策。”^[12]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中国人在世界秩序观念上贯彻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文化发生了疏离。中国较为注重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虽然曾经有武力干涉的先例,但并不是主流。滨下武志认为:“中华世界秩序的前提是将德治视为至高无上。”“尤其是皇帝是德治的体现,其威光四及,沐浴其恩惠者便自发地纳贡,这种中华理念也可以认为是一种世界秩序观。”^{[13]54}空前严重的危机,使得这一崇尚和平秩序的国际观念在清末彻底瓦解了,让位于以丛林规则和无政府状态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理念。清末国人一方面是对国际社会平等成员角色的期望,另一方面,则是难以摆脱的不公平现实,这使得他们一方面在谴责强权政治,另一方面却在大力宣传天演之道。谴责强权就表明了对世界正义公平秩序的向往,提倡进化论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强权的合理性。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从根本上偏离了人类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此种解释框架比传统的观念更适应于充满激烈竞争的近代社会。中国人希望借助竞争自强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促成中华民族在世界格局中占据自己应有的地位和获取现代国家的资格^{[14]313}。以德性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秩序观念被彻底解构了。

二、民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顺从和反抗

辛亥革命和民国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身份使得中国人备感耻辱。在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经历了五四启蒙之后),反对强权、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潮一路高歌猛进,主导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无论是动荡不安的北洋政府还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都将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的重要内容,试图通过合法、温和、竞争的手段挑战不平等国际秩序,以期获得平等的国际地位。而中国共产党人则以革命者的姿态,成功地建构了帝国主义概念,并使其成为比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有影响的思想资源。

(一)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际秩序观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作为继清政府之后中国政权的统治者,虽然也曾屈从于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但他们更多地充当着国际秩序对抗者和挑战者的角色。民国建立之后,中国内部深刻的政治变革已经开始,国际地位在跌落至最低点后也由于人民的觉醒和斗争而开始缓慢回升。依靠国内高

涨民众运动的支持,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期望通过温和、合法手段获取在世界秩序中的平等地位。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政局动荡不安,但外交却能够保持稳定性和延续性,因为外交事务一直由一批素有国际声望的职业化外交官所掌控。北洋政府一直希望通过参加国际多边机制,借各大国之力实现国家地位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他们提供了参与世界秩序构建的舞台。在欧战方炽之时,有人主张:“此次战事……我国外交不于此时自启新局,闯入局中……以求一自全之道,必待局势,既或屏诸门外以听他人之处分,不将从此而沉沦耶!”^[15]梁启超主张中国参与欧战,从而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他指出:“因应大事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表现,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16]35册4-5}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使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巴黎和会是中国打破旧的世界秩序的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在会上中国人提出了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并且成功地废除了中德、中奥条约,从而打开了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缺口。巴黎和会“中国与外国的条约关系,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和另一个时代的结束”^{[17]300}。北洋政府谋求国际地位改善的表现还有修约外交。1925年到1928年北洋政府鉴于以前向列强集体提出修约没有太大成效,开始考虑变更策略,采取各个击破的“到期修约”方针。1925年五卅运动以来民气激昂,南方革命政府实行的革命外交,成功地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为北京政府修约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北京政府于1926年11月、1927年11月单方面宣布废止《中比条约》、《中西条约》,对不平等国际秩序进行了有力的挑战。近代被迫卷入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不断面临的是失败和挫折。晚清政府时期中国以弱者的地位,对世界问题很少发言,总是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外部世界,在各国纷争中力图保持中立和超然。而北洋政府改变了这种状态: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走入世界舞台,表现出国际秩序挑战者的姿态。如张永进所阐明,民国在其1918-1920年外交中第一次自觉地进入“国际社会”,并同意遵守理论上约束国际行为的条例和规范。中国成了国际联盟“宇内合作”(借用凯欧汉的说法)的积极分子。从中国外交的发展来看,这段历史没有丰碑,但为丰碑的奠基却从这里开始^[18]。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南京政府继承了北洋政府的修约政策,与苏联、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和世界革命阵营渐行渐远。但南京国民政府保留了“革命

外交”的一些特征,如“革命外交”的名称本身、“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不轻易妥协的特色^{[19]380}。整个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国际秩序挑战者的姿态比北洋政府时期更为明显。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展开了修约交涉,可谓成绩斐然,在5个月的短暂时间内,与12个国家订立了12件条约。1928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作了题为《外交如何可以胜利?革命如何才算成功?》的演讲:“如果能团结奋斗,我相信我们预备工夫至少亦要三年,但最多不过十年,如此我们国家可以独立自由。”^[20]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美列强需要更多地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平等地位的愿望更加强烈。1942年,宋美龄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如是我观》:“西洋人的政策,除基督教会传道的以外,处处表现在他们意欲尽可能地用暴力来掠夺我们,凡是他们所到手的东 西,则一点也不肯放松,不肯发还一些给我们。西洋各国对于中国,心中老是抱定了自居优越的宗旨,而且不论时境有没有变迁,总是不肯放弃这种优越之感。”^{[21](11)5117}“西洋人必须改变他们对于东方的观念,我们中国当然也应该尊重西方国家,在我们所要兴建的未来世界里,不应当再有谁是优秀谁是低劣的思想存在,应当人人平等,全世界各民族的男男女女大家携手往崇高的理想迈进。”^{[21](11)5122}从宋美龄演讲不难看出中国人谋求国际平等地位的愿望多么强烈!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强烈愤慨,但认为中国应该通过温和方式对现行秩序进行修改,重建合理的国际秩序。如蒋介石提到:“现在廿世纪时代各国所应有的国际上的惯例和法律,我们中国人自然不能居于例外。”^[20]1935年12月18日,张群继任外交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谈话,向各国表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愿望,谓:“中国所有对外基于条约之特殊义务,世人均知其不合时宜,且妨碍中国之发展,吾人最大之希望,自在经由合法途径,设法解除此种特殊义务。”但“吾人基于信用,仍须忍耐遵守”^[22]。1941年1月16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在纪念周作《最近国际形势与我国外交》报告:“只要我们本身发奋图强,不久的将来,我们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与重订平等条约之时,亦即为我国与各国立于平等地位之时。”^[23]随着二战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英、美等国终于放弃了领事裁判权等条约特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废约目标得以基本实现。

(二)共产党人的国际秩序观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将反对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作为重要的革命任务。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

通过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成功地建构了一套“帝国主义”话语,成为打破现行国际体系重建合理国际秩序的思想资源。“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将中国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从分裂分散的列强转变为整体性、同质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形成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二元对立的世界模式。

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成为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武器。在1921年底到1922年初召开的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接触这一理论。共产国际领导人萨法洛夫在大会的报告中说:“不可不在本会中格外提及的,更要促起大家注意的一桩事实:就是去巴结全世界资产阶级和巴结帝国主义强国的法门,并不是救助被压迫民族和半殖民地的道路。诸位中间有好多人,一年或十八个月以前,曾信赖巴黎和会,盼望这班帝国主义强盗中的一派或那派去帮助他们的,现在都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现在已经觉悟到向这般强有力者呼吁求助的无用了”^{[24]147}。他抓住了中国知识青年由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而产生的幻灭和无助心理,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理解世界政治秩序的观念框架。“帝国主义”这一话语将中国所遭受的不平等的国际待遇指向同质的帝国主义国家,国际秩序的根本改善和国家平等地位的谋求需要通过暴力斗争而非合法斗争获得。中国人所面对的纷繁复杂的国家被简化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二元结构的国际体系中,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一切贫病的根源。正是在这一理解世界秩序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陈独秀谈道:“我们敢公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人:以革命行动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知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知经济的侵略机关,归诸国有……必须这样,才算完成了民族革命。必须这样,我们才能脱离外国之政治的统治与侵略。”^{[25]下册355}在大革命的大风暴中,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不平等条约运动如野火燎原,波及中国全部。“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侵华成为20世纪许多中国利益团体始终感兴趣的题目^{[26]154}。“不平等条约”的出版热表现出中国人对抗现存国际体系的态度。从1925年到1930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趋势和变迁》再版11次,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题目中含有“不平等条约”的书籍有10多种^[27]。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这一国际秩序观念的指导,在国民革命、土地战争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在外交活动中表现了激烈的反抗者的色彩。

三、新中国：从世界秩序的革命者到建设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从客观上强化了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批判的、革命的态度。从主观上讲，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革命目标，也内在决定了中国要做现行国际秩序的叛逆者、革命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由超脱于世界多边合作开始转变为积极参加多边国际合作。在此过程中，中国人逐渐从世界秩序的革命者转向了积极的构建者，实现了从国际秩序的对抗者到融入者和改造者的身份转换。

（一）改革开放之前：国际秩序的革命者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终于走出了被困扰了一个世纪的深重民族危机。但是冷战的国际环境，以及包括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境战争等一系列热战强化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早在1947年12月底，毛泽东就开始使用“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概念。新中国建立之后，作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仍然缺少话语权。从50年代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对抗，到60年代以后与苏联的斗争；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两大阵营”理论到60年代的“世界革命论”再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内涵有所不同，但作为国际秩序的不满者、挑战者的姿态是一致的。1970年5月发表的著名的5.20声明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的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毛泽东在对国际安全和战争形势的判断是：“国际间的和平条约是相对的，国际间的斗争是绝对的。”^{[28]卷5273} 中国认为现行的国际秩序是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体现了他们划分世界的意图，反抗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长期任务，即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主张也是以国际斗争的思维框架作为背景的。正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为表达自己的声音赢得了制度化的舞台，紧接着与美国关系解冻，迈出了融入国际秩序的关键一步。然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评判世界秩序仍是一种主流思潮，与西方社会的对立思想仍阻碍着我国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二）改革开放之后：和谐国际秩序的建设者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理论，试图通过走国际化道路影响现存的国际秩序。邓小平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后变的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29](3)64}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从国际秩序的游离者成为国际秩序的积极建构者。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成就令世界瞩目。中国的崛起必然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有必要也有机遇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力争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塑造者。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一改先前对多边机制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开始积极参与多边机制，并由经济领域向政治乃至安全等领域的多边机制延伸，最终成为国际政治中多边主义的拥护者。正是在国内经济变化和多边外交活跃的情形下，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阐述了对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看法，主张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民主、和睦、公正、包容^[30]。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在承认现行国际秩序客观性与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上，在道义上批判现行国际秩序的缺失，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体现了我国对于现行国际秩序的保留^{[31]11}。

和谐世界是塑造中国形象的话语手段，可以有效地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当代中国正处在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决裂的意识形态转型期，过去几十年盛行的“斗争哲学”、“革命路线”已经淡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提出中国的话语系统必须要求对中国传统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评判。而传统外交哲学中“和而不同”、“仁恕之道”思想以及一贯的和平主义传统和成为构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有效资源。和谐世界理念是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和平意愿的明确信号。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存秩序，中国不会做体系的挑战者，而是要做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

四、结 语

从对传统以和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观念的背离到重新肯定和谐世界，表明了中国人对于传统世界观念的重新认识。但是，和谐世界观念绝对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在融合了新的时代元素基础上提出来的国际秩序构想。和谐世界理念核心是国际民主和

平等,与古代等差有序的“和谐”理念有着本质不同。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有序世界是建立在中国威慑力的基础上的,是基于儒家伦理观念建立起来的一种主从关系,是在承认主从关系基础上的一种和谐。反观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对“和”观念的否定与肯定,与中国的沧桑变迁息息相关。无论如何变化,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对传统以“和”为主的国际理念的颠覆是为了借助达尔文主义激发民族主义,维护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而现在对和谐理念的肯定则是为了在世界秩序转换的关头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更好地维护本民族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2] 夏东元. 郑观应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3] 王尔敏. 十九世纪中国十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M]//王尔敏.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80.
- [4] 论政府近日之政策[J]. 通学报,1907,36:541-542.
- [5] 中国史学会主. 戊戌变法[Z]. 上海:上海出版点出版社,1982.
- [6] 宝璠等.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Z]. 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
- [7] 朱熹. 四书集注[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8] 林永宣. 论二十世纪国际竞争胜败之总原因及中国于世界上之位置[J]. 东方杂志,1907,8.
- [9] 对于英日新协约之感言[N]. 大公报,1905-01-25.
- [10] 尊侠. 日法日俄英俄协约关系中国及西北之危机[J]. 夏声,1908,1.
- [11] 公法关系论[N]. 申报,1903-10-09.
- [12] 粤隶对于澳门地界办法之迟缓[N]. 中国日报,1907-12-02.
- [13] 山本吉宣. 国际政治理论[M]. 王志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3.
- [14] 杨念群. 危机意识的形成与中国现代历史观念的变迁

- [C]//王笛. 时间、空间、书写.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 [15] 宪法研究会关于对德外交之宣言[N]. 晨钟报,1917-05-06(1).
- [16] 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7] 李育民. 中国废约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8] 柯伟林. 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J]. 二十一世纪,1997:44.
- [19] 唐启华. 北洋外交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G]//. 金光耀、王建朗. 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 [20] 蒋中正. 外交如何可以胜利? 革命如何才算成功? [J]. 国闻周报,1928,6(1).
- [21] 陈志奇. 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Z]. 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
- [22] 张群发表外交政策,国闻周报[J]. 国闻周报,1935,12(50).
- [23] 克成. 王部长报告最近国际形势[J]. 东方杂志,1941,38(2).
- [2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Z].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5]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M]. 北京:三联书店,1984.
- [26] 王栋. 北洋时期的国际法在中国[G]//金光耀、王建朗. 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 [27] 北京图书馆. 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Z].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 [28] 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 毛泽东集补卷[M]. 东京: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1984.
- [29] 邓小平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EB/OL]. (2005-12-22)[2008-05-08]. http://202.123.110.3/xwfb/2005-12/22/content_133974_5.htm.
- [31] 蔡拓. 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G]//. 蔡拓. 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张颖超

The Chang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Ideas about the World Order at Modern Times

REN Yun-xian

(School of Marxism,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Abstract: Harmony was the prevailing wind in ancient China as far as the idea about the world order was concerned. But it was cast away and gave place to social Darwinis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s a result of the desperate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s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discourse of Imperialism, the Chinese People's idea about world order showed mor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in 1978, the philosophy of struggle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was replaced by the “Harmonious World”. The change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harmon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China in the modern times.

Key words: world order; China-centeredness; imperialism; harmonious world